

2012年，中國的政治發展注定又要走到一個新的十字路口。在未來，中國是不是依然會像辛亥革命後的百年歲月裏，始終遙望自由民主憲政的大門卻無法企及？毫無疑問，這是所有海內外的中國人都無法迴避的問題。因此，明年是一個「講政治」的年份。我刊熱切歡迎海內外作者，從各種角度撰文，探究中國的政治發展模式。以中國政治為主題的投稿，將優先安排刊出。

——編者

如何傾聽「西藏人民的聲音」

近年來，在民族主義、後殖民主義、馬克思主義等多重理論視野中，民族共同體的本質化描述正被文化建構主義的反思性論述所取代。2008年中國發生的一些社會事件刺激了這一反思過程：一方面是以奧運為承載的「中國夢」敘事生產，另一方面則是西藏的騷亂事件，使「中國夢」下潛藏的民族問題浮出水面。正如〈「西藏人民」能說話嗎？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11年10月號）作者姚新勇等所說的，「從2008年起，中國族群問題成了一個再也無法遮蔽、隱瞞、迴避的公共問題」，對「民族—國家」建構性的思考，再次開啟了知識份子介入社會政治的契機。

作者借斯皮瓦克 (Gayatri C. Spivak) 的「底層」言說「西藏人民」，通過三個歷史時期的文本解讀，揭示出「具體而實

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

在的普通西藏人的聲音被遮蔽的現實」。從1960年代的農奴翻身敘事、「魔幻西藏」，再到消費文化下的「東方主義」想像，「西藏」經歷了一個不斷被他者化的過程，而主流意識形態仍然試圖維繫着「藏漢一家親」的民族團結「偽神話」。在「中共政府、西方、達賴喇嘛、新興民族—民主精英份子以及中國愛國主義等各方言說的糾結中」，「西藏人民」恰恰成為了不能發聲的空洞主體。不過，作者也意識到，簡單地去指認所謂「真正的西藏人民」和「西藏人民的聲音」，並無助於打破既有的權力結構。儘管斯皮瓦克對於底層能否發聲表示悲觀，但她將反抗的力量訴諸於意識形態鬥爭中「再現／代表」(represent) 的作用：鬥爭的關鍵不在於這種「再現／代表」是否真實，而在於如何能夠將「個體」再現為「主體」，從而去反轉和突破主奴結構。

如何傾聽「西藏人民的聲音」不應執迷於本真性的追尋，而是需要在中國具體的社會關係中重建新的再現方式——既要避免將西藏他者化，也應警惕西方民族主義的話語模式。

吳舒潔 北京

2011.10.22

革命和「告別革命」

陳建華的〈辛亥，死活都要「革命」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11年10月號），考釋了「革命」這個上古中國的天命話語，如何在辛亥前由奴入主（由日本傳入中國），經過孫中山實現了現代性的轉換，成為既有湯武的朝代交替，也有政治改革的正當內涵的新語，從而佔據了意識形態的制高點，乃至人人都要「革命」，死活都要「革命」，因而對清廷採取「革命行動」就勢在必然了。

的確，「革命」是二十世紀中國最響亮的話語。後來「革命」的演繹更是一浪高過一浪，從「國民革命」、「土地革命」、「社會主義革命」到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，終於歸根結底為「革命無罪，造反有理」的極致；一代接一代的中國青年，包括大批知識份子將青春、理想、熱情和生命獻給了一場又一場的「革命」。但是，在世紀末的回首中，卻又響起了「告別革命」的呼號。

「革命」話語真的那麼具有魅力，足以「一言喪邦」、叫人生死相許？然！否！歷史學家一定還會爭論下去。辛亥一百年過去了，中國有了很大

的變化和發展，但離先烈們拋頭顱灑熱血所追求的自由和民主社會，仍路途遙遠。

梁加農 多倫多
2011.10.19

民初恢復君主立憲制為何不行？

如果破除革命史觀的主導，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複雜多元的辛亥革命。郭紹敏的〈君主立憲制與中國民族國家建設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11年10月號）一文以楊度的言論為文本，探討了君主制對於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具有多個層面的意義。

雖然在楊度看來，袁世凱的帝制有其合乎時代需要的成份，但事實上沒有得到任何勢力的支持。因為袁恢復帝制，即使是其嫡系的北洋系統的段祺瑞、馮國璋等將領，也因上升途徑受影響而背棄袁，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主共和新體制的實際影響。一向支持恢復君主制的遺老不但不表贊同，甚至指袁為國賊，如袁在大造恢復帝制輿論時，張勳慷慨解囊，但當他得知袁是要自己當皇帝時，即撤回此前的資助，可見袁的帝制缺乏先天的合法性。

從民國初年兩次復辟的失敗可見，進入民國以後，雖然國家整合陷入種種困境，但事實上已無法通過君主立憲制解決困局，歷史畢竟無法逆轉。但同時，現實中擁有權力者卻又不是眾皆認可的權威，由此造成民國初年政治上的亂象。

嚴海建 南京
2011.10.23

革命黨人與黑龍會

王柯的〈民權、政權、國權——辛亥革命與黑龍會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11年10月號）一文，充分利用日本的檔案資料，考察了「黑龍會」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活動及其對辛亥革命的影響，從一個側面豐富和充實了辛亥革命研究。

文章揭示出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等以「東亞先覺志士」自居的大陸浪人，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是另有動機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，就是要將東北和內蒙古東部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內。1911年，內田良平拋出〈支那改造論〉時，顯示出日本政府「改造支那帝國，建設新政府」的野心。1914年起，當意識到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在領土問題上並不妥協後，內田良平再次拋出〈對支問題解決鄙見〉與〈對支私案〉，提出分裂中國的主張。這些言論成為日後日本侵略中國的重要依據。

文章提及的孫中山、黃興、宋教仁等辛亥革命領袖，都或多或少與日本大陸浪人有過種種聯繫，都曾經得到他們的支持。但是，在中國領土問題上，革命黨人與大陸浪人的交往中，到底持何種態度，作者並沒有交代清楚。

張慧卿 南京
2011.10.20

歷史的過去與未來

歷史像是一個雙面神，一面朝向過去，一面朝向當下及未來。這一比喻的一層意思是說，人們對於過去的理解與再理解，往往受到當下關懷與對

未來期待的影響。高力克的〈孫中山的「大國之道」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11年10月號）即可作如是觀。

高文認為三民主義是會通了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現代文明、富有高遠文明理想的中國現代性方案，對其蘊含的遠見卓識予以高度評價。這似乎與我們當今狀況與未來預期不無關聯。可以說，三民主義所昭示的價值和理想並沒有過時，對中國的發展仍有參考意義。

「民族主義」。中國自1840年代開始長期受到西方國家的擠壓，不得不從傳統的「天下」秩序轉向民族國家的現實建制，以凝聚認同並動員社會。我們並沒有拋棄王霸之辨和大同世界的理想，而這理想在當今中國國力日益強盛之時，有了更大的現實性，我們在追求自身國家利益的同時，也開始逐漸強調擔當國際道義。

「民主主義」。我們今天所走的似乎也是一條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中間道路，自改革開放之後，經濟取得迅猛增長。人們在關注貧富懸殊問題時，「民生」成了一個社會流行詞。孫中山當年所說的「平均地權」與「節制資本」兩大方針，與當代經濟生活也並非風馬牛不相及。

「民權主義」。孫中山當年所追求的還權於民的「憲治」建國理想，與我們的威權治理相差甚遠。因此，如何建設民主、自由、法治、公平的社會，依然任重道遠。

呂文江 北京
2011.10.20